

新书掠影

作者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服装变革历程进行了全面且详尽的比较,并以此向我们演示了衣服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是如何变化的。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 [美]戴安娜·克兰 著 熊亦冉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70位对考古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勾勒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轨迹,呈现了这些考古学先驱的坚守与执着。

《伟大的考古学家》 [英]布莱恩·费根 主编 李志鹏 李凡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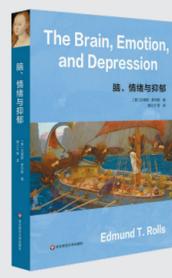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深入研究“侨批”和“侨批”贸易的起源、结构、特点与运作的经济类著作,有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 [英]班国瑞 刘宏著 贾俊英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2月出版



全书冷静客观又真实温暖地记录了普通中国警察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所做的贡献,书写他们不事张扬的奉献精神以及埋藏在日常工作之中的英雄主义情怀。

《讷河往事》 黄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是什么产生了情绪?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大脑如何表征商品的价值?大脑如何执行决策?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本书探寻对情绪和决策的解释。

《脑、情绪与抑郁》 [英]艾德蒙·罗尔斯 著 傅小兰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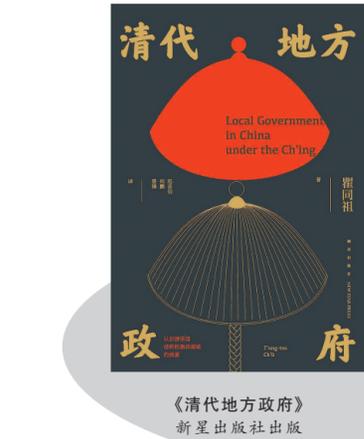
以细节观照明清中国基层政府运作的真相

王 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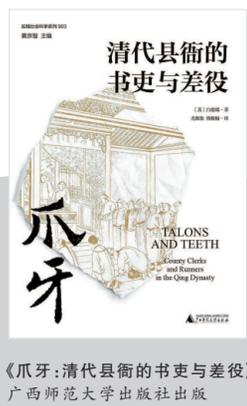
在我们的阅读印象中,传统的历史读物大多是与大人物的宏大叙事分不开的——所谓帝王将相、风云人物;所谓朝代兴亡、重大事件;几乎囊括了传统历史读物的所有内容,其中几乎看不到小人物的身影,当然更不用说那些涉及到小民百姓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了。所以梁启超才会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民百姓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不重要,恰恰相反,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小民百姓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才真正构成了历史的主体——大人物只能代表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宏大叙事也只能代表历史的某些个短暂的瞬间。历史的主体其实是庸常的、世俗的,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够代表历史的常态。正所谓一叶知秋,正是从这些日常琐碎的细节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传统基层官僚机构的运转方式,同时也可以看出小人物在维系国家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所起到的作用。

探究非正式性因素在基层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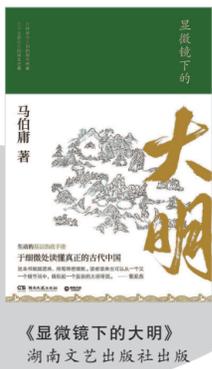
长期旅居西方的历史学家翟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是一部在西方汉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实际构成以及具体运作的模式。但与我们过去所常见的同类著作相比,作者并没有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制度的正式性和官方性方面,也没有以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去切割中国古代政治史,瓦解其特有的整体性特征或风格,而是更加关注非正式性、私人性的因素在基层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不成文制度或法律性惯例在非正式、私人性因素影响下形成和作用的过程。清承明制,在正式性的制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在正式的制度方面,清代与明代同样相似的是,清代地方政府实际的政治运作与成文法规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把清代中央政府



《清代地方政府》 新星出版社出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显微镜下的大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比作县官,把州县地方政府比作现管,那么翟先生的着眼点即聚焦在现管的层面上:州县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州县地方政府由哪些人员构成、州县地方政府有哪些主要职能和具体的执行方式、作为官民中介的士绅群体对州县地方政治有哪些参与方式和影响……不是以宏观的视角去看待清朝的政治架构,而是深入基层州县去看地方政府的具体运作,这正是翟先生这部著作最鲜明的特征。

州县地方政府是构成清代中央政府的基石,这一点并无疑义,然而,清代中央政府所颁布的正式的法律和法令,真正落实到州县地方政府,却往往大相径庭——县官下达了命令,到了现管那里,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个中原因,除了执行的力度常常被打折之外,更关键的因素来自于执行者自身,亦即构成州县地方政府的四类人员:书吏、衙吏、长随、幕友。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法令,其实是与他们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他们也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将这些政策大打折扣,使

之倾向于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

既然州县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以人制人,以事防事”,那么,个人素质和能力就决定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模式,尤其在涉及亲朋好友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助员们必然倾向于徇私枉法。而当政府的正常行政费用必须由州县官个人负担时,陋规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政府费用和个人收入的出处——尽管这种惯例并不正常,却在法律默许的范围之内,而陋规与贪贿之间也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从而揭示了私人性、非正式性因素在清代政治中的一种实际作用。

以多元的视角审视吏役的所作所为

如果说翟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是用以线串点的方式,揭示了清代地方政府运作的秘密;那么,美国汉学家白德穆的《爪牙》则是一部用以点串线的方式,来揭示清代衙门书吏与差役日常行为模式的著作。

白瑞德笔下的“爪牙”包括两种人:

一为书吏,指的是县衙中承办文书的吏员;一为差役,指的是负责执行大量与县衙行政活动相关的非文职工作者——县衙原是大清帝国最基层的官僚机构,县官充当着联系朝廷与地方社会的纽带,书吏和差役则操纵着县衙日常行政事务的运作,是县域内大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按照清廷的初衷,一个理想的基层官僚机构应该是符合意识形态的完美设计,代表着皇权与更高层次的原则及正义之间不偏不倚的结合,然而理想的官僚机构虽然有法律作保障,却很难在现实社会中落地生根。

在清廷颁发的正式法令中,吏役虽然正式编制,也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而且清廷虽然对书吏和差役的人数以及他们工作的性质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随着清朝人口的迅速增长,商贸活动不断扩张,犯罪增多,治理困难,县衙实际需要的吏役人手,已经远远超过官府规定的人数数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县官面对朝廷的法令阳奉阴违,在县衙的日常事务运作中不

得不录用大量的吏役;另一方面这些吏役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只能通过收取各种规费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尽管县官明知吏役的收入来源不合法,却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吏役则声名狼藉,备受攻讦,成为底层社会良法美意的破坏者与贪腐的象征。

事实上,吏役怎样收取规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作为一个标准化的程序确立起来。以巴县县衙为例,吏役们不仅有着明确的组织架构,有着默契的分工与协作,而且还制定了收取规费的各种规矩——诸如人员的调配、规费的收取标准,以及内部违规的惩罚或流程等等。在长期与官府打交道的同时,吏役们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我保护策略。比如,每逢县令换届之际,巴县衙门中的书吏们通常会向新县令报告县衙内能够容纳的人数,以提醒新县令限制吏役的人数,不要“滥招”。每个吏役的晋升,或获取级别较高的职位,都有一定的排名,而且需要交纳一笔参费,用作衙门内的日常运作或办公场所日常修缮的费用。

可见吏役们并没有将收取规费看作是一条发财致富的渠道,而是视之作为一种可以用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而且吏役们也一直在尝试着将他们的角色正当化,为保护其生计和个人荣誉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白瑞德提醒我们,尽管吏役的所作所为有很多是非法的,但他们又的确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应该以多元的视角审视吏役的所作所为——只有抛开吏役腐败的先入之见,才能够透过巴县县衙日常运作的过程,看出晚清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产生的现实效果。

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同样是以小视角审视大历史,与以上两部曾经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汉学著作有所不同,满族作家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从一个历史的小切口进入,通过一些小故事或一些具体

而微的细节展开历史的叙述,来观察历史的某一个切片或某一个维度。虽然马伯庸的作品走的也是微观史学的路子,但他的主题更集中、更鲜明,当然也更能体现出以小见大的优势。

顾名思义,《显微镜下的大明》即是明代基层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亦即通过检验一些细胞的变化,来判断大明王朝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比如《学霸必须死》,表面上讲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在剖析涉及其中的利益集团如何博弈与如何较量;《笔与灰的抉择》表面上讲述的是婺源县境内的一条龙脉引发的争议,实际上是在剖析相关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其间的利害关系;《天下透明》表面上讲述的明廷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探讨明代政治一步步垮掉的原因……

我感觉最有趣的一篇是《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其中不仅涉及到案中案和连环案,几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同时还涉及到官场内部的钩心斗角,地方律政的尔虞我诈。而各种表面文章,以及逻辑上的小花招更是层出不穷,微妙之处往往不可言说,只可意会,有时看似官员之间相互踢皮球,其实却隐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文章讲述的案子本来只是一桩并不复杂的地方乡民诉讼,却在审理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复杂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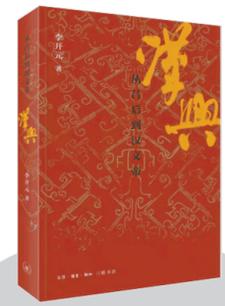
诚如马伯庸所说:“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不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而马伯庸之所以写作这部《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为了给视角太高的传统历史注入一些体贴的人情味,让充满了迷人细节的历史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只有当这些普通读者真正了解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时,他们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看清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三味书屋

问史于天地之间

——李开元《汉兴》读后

常绍民



《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 李开元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刘邦早年活动的地区问旧访古,其熟悉程度让我等当地人汗颜。已故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这样评价:“多走,走出治史史的特色来,这是难得。多走,走出行走历史的理念和风格来,这就可贵了。”《史记》以文字优美、叙事生动著称,“无韵之离骚”是也,这也是李开元叙事三部曲竭力追求的:“三部曲的写作,是重振叙事的努力,为历史学收复了失地,拓宽了领域。”“通过这本书,我也想表达一种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这点得到了读者的认可,邢义田先生更是认为从中“看到了历史学家重振叙事的卓越努力”。并非偶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为了寻找历史真相到处游历,他的《历史》就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能给读者以美好享受的文学读物。“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们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这与李开元自述的著述动机也不非常相像吗?

不过,到《汉兴》出版之际,作者更愿意将其写作方法称为复活型历史叙事,并以此为傲:它们“不是小说,不是演义,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读物,不是公众历史写作,而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更具体一点,三部

曲,是复活型历史叙事”。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史书,可信度高,可读性强。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经过考证的,是可以证明和证伪,可以讨论的”。其中,《汉兴》是作者心目中的终结篇和前两部著作的升级版,是其“终身之志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复活或者说还原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追求。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地掌握新旧各种史料,要在方法上做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微观上要善于发现历史中新奇之处,会讲故事,注重将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宏观上则要有对历史命运总体的思考,要掌握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同时要有经年持续不断的研究作支撑。在这些方面李开元先生确实有可夸耀的资本:不算早年积累的,仅仅为了此三部曲他就花了20年的时间。三部曲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秦末汉初改朝换代的风云激荡时期:“我整理历史,写《秦崩》《楚亡》《汉兴》,叙事从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于楚国沛县开始,结束于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故长安。时间的跨度,整整100年。”具体说来,《秦崩》中,大厦将倾,天下大乱的叙事,是这种历史特点在国家政府层面上的体现。体现在民间下层,有亭长刘邦的人际交往、陈国后裔陈胜的坎坷人生、韩国后人张良的复仇隐逸……《楚亡》中,有王孙韩信的淮阴生活、英国后裔英布的逃徙亡命、贫民陈平的乡里社稷……在《汉兴》中,以叔孙通为主线的儒生群体之遭遇,更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

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严格说来,要到秦代才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对此李开元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一套后战国时代理论。不过读者的感觉时常与作者有偏差。具体到《汉兴》,书中尽管讲述了一些普通民众的故事,比如民间女子田南的爱情悲剧,意在展现底层平民被国家政策绑架的无奈命运,以及医生淳于意的事,涉及中医中药与黄老之学的渊源等,但全书关注的重点仍是汉帝国及帝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传统的意义上解读这个时代,可以用‘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来概括;在现代的意义上重新诠释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华帝国2000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中,唯一一次在体制上出现了新的转型之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新的转型的方向,就是脱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帝国体制,逐步走向统一法制下的分权政治体制”。叙事与思辨,想完满地结合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汉兴》一书洋洋40万字,篇幅远多于《秦崩》和《楚亡》,主要是作者想让它承载更多的更深层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李开元对其三部曲尤其是《汉兴》另一自得的方面是其战国时代说,并在《汉兴》一书中设专节阐述。这一问

题属于制度史范畴,应算北大史学的一个传统,李先生入校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说治史有四把钥匙,其一就是职官制度。具体到李开元本人,中华帝国的起源问题是他治史生涯中着力最多的一个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这样评价《汉兴》:“书中既有精彩的历史故事,也有深入的学术探寻。作者笔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和事件,已经触及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秘密。”彭教授没有展开论述,以我对他的了解,“深层秘境”指的应是此帝国问题,或者李开元后所说的后战国问题。李开元的成名作为《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据其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代表了其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旨是从起源问题入手研究中华帝国。中华帝国始于秦朝,本应从它开始,但该王朝存世时间短,保存下来的资料甚少,从汉朝入手更为妥当,一方面汉朝史料较为丰富,另一方面,“作为秦王朝之领土、人民、制度、文化等之全面继承者,稳定地持续了200年之久,中华帝国之定型,正是在西汉王朝——基于此,通过研究西汉王朝之起源以了解中华帝国之起源的方案,遂不失为一种可行可取的案”“西汉王朝,乃是刘邦集团通过长期的战争所建立的。刘邦集团,是西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集团之发生发展,成长壮大,一天一天的过程,就是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换言之,汉帝国起源于刘邦集团,刘邦集团之结构和性质,规定了汉帝国之结构和性质之起点——因此之故,

笔者——意图清楚地通过对于刘邦集团之彻底分析以了解汉帝国之起源,在确切的起源之上来分析其结构。”作者本拟选取西汉整个王朝作为解剖对象,但因一些原因着重研究的是汉初60余年。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这部专著重点探讨的是西汉初年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此阶层的母体是起源于芒砀山群盗的刘邦集团,它曾支配汉朝政权约半个世纪,至汉武帝时期方消亡。通过对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分析,李开元认为至秦王朝为止的中国政治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形态类型,即王业、霸业与帝业。所谓王业,指的是以周为代表的分封诸侯、众建列国之政治形态;所谓霸业,指的是春秋战国之列国纷争求霸的政治形态。而帝业始于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帝国。秦国实行郡县制,废除封建制。汉帝国建立后,实际上恢复了秦统一以前天下七国的局面,实行郡国制,即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李开元在历史叙事三部曲中所说的新的转型之可能,就源于此。他近些年一再谈到的后战国说,也可以说是此论之延伸和发展。当然,历史长河转了个弯,重又回到秦王朝开创的轨道上。《汉兴》第二章“修剪枝叶”和第三章“群雄的末日”,重点讲述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消灭异姓诸侯公爵、爵归国家直管的过程。三部曲表面通俗,实则入心深意。李开元的研究,“蕴藏着多年学术研究的深厚功底”(刘复生语)。

“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的探索,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现自我变革。”这是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句名言。钱穆也曾说过:“知道历史,便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语)两位大师的话,似可作为翻译李开元《汉兴》及其他著述的一点体会。